

# 论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三个维度

■ 黄 亮

(中央团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北京 100089)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制度建设,为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方案。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矛盾、新使命,持续有效地对青年开展制度自信教育,是做好新时代青年思想引领、提升共青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度的必然要求。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应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厘清教育内容和思路,让广大青年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制度观、感悟制度文明的守正创新、体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过程中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更好地贡献青春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 制度自信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5.00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应通过关于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引导全党和全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涵并充分感受其优越性,从而更加坚定全国人民的制度自信。青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承担着重要使命,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制度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sup>[1]</sup>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必然表现为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的统一<sup>[2]</sup>。青年工作者要不断创新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方法,努力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多角度把党的科学理论讲深刻<sup>[3]</sup>,让青年能够切实感受到制度自信教育的理论魅力、历史底蕴和终极价值。

## 一、树立马克思主义制度观: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理论逻辑

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时强调,要教育青年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打下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认清中国和时代走向,把握时代脉搏,正确理解和承担新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集中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收稿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黄亮,中央团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青年思想引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项目“政法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课题编号:16JDSZK028)、中央团校重点攻关课题“共青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职责定位和作用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编号:2019M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它所包含的关于制度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制度思想的科学性,树立马克思主义制度观,是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理论逻辑。

#### (一) 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制度思想的逻辑起点

“人”既是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终极目标。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关于制度的起源也应该从人开始考察。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生活实践中通过物质、精神等活动结成各种关系。最开始,人们在自然的改造中形成了共同劳动和相互交往的关系。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深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人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由其生物自然性本能而决定的群居倾向,而转化为一种人们在具体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必然联系”<sup>[4]</sup>。人必须通过生活和生产实践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假如不用特定关系模式联合起来活动并互相交换活动,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sup>[5]</sup>。于是,人们为了让“共同需要”得以实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往活动。人们的实践活动较之结果更注重过程本身,制度形成的空间就来自从生产到交往再到生产的过程。由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都有一定的目的性,这就要求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要具备客观有效性,需要以适当的交往方式、交往目标以及交往的环境条件等,以更好地实现交往主体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有特定的规范来保证其交往活动有序进行,从而保证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展示自身能力和观念,表达意志和情感等。当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活动规范也就呈现出历史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制度。

所以,人类实践以及服务人类是制度的产生、存在以及发展的本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历史发展必然性和人民选择应然性的结合。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决定了制度本身生命力的强大与否,而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又决定了制度在人民心中的自信度。从这样的关系视角看,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始终关注人民的实际需要,将能否达到人民满意作为制度建设的依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不断探索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九十多年奋斗的智慧结晶。作为经过科学设计、论证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的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实现、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障,也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广大青年应该坚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用自己的青春力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之道。

#### (二) 科学治理:马克思主义制度思想的实践观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治理并未有系统论述,但是他们的一些文章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治理方式,并总结了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社会治理经验,他们的治理思想在其中有所体现。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资本论》以及《共产主义原理》《论住宅问题》等文本中均有所体现。由于和西方国家的国情、社情不同,我国在制度建设中自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治理理论,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思想的丰富内涵中汲取养分,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不断发展进步。

关于社会治理,马克思首先认为“各种政权建立最初都是以相应经济形态和社会职能作为执政基础。”<sup>[6]</sup>恩格斯也强调“执行特定社会职能一直都是政治统治的执政基础,并且这种对社会职能的不断执行才保证了政治统治的持续执政。”<sup>[7]</sup>这其中蕴含着对于社会治理在政治统治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的确定。同时,恩格斯还用实例进一步说明“一切统治政府都非常明

确自己相当于河谷灌溉的总闸”然而,英国政府却“未能充分重视那个能够让他们持续统治印度”持续进行的“合乎某种规律的行为方式”<sup>[8]</sup>。恩格斯还认为,作为政府,一方面应不断强化建设政法、军事这些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更要强化关系民生的治理职能,这对于巩固政权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英国长期忽视社会治理,也未能对关乎民生的社会治理给予较多的关注,直接导致了其在印度的政治统治以失败告终。

正确有力的政治统治是社会治理职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在对影响阶级统治的经济、社会等因素作了详细分析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国家公共职能”和“政府统治权威”<sup>[9]</sup>两种职能,相应地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国家职能,即“对从各种社会形态和性质而产生的相应的公共事务加以执行”和“基于政府与人民群众在对立中形成的特殊职能”<sup>[10]</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传统国家性质的社会治理实质是阶级压迫式的政治统治,即少数人口数量的剥削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而在无产阶级国家,尽管也有一定的政治统治职能,但更多地体现出很多新特征:比如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的全新变更,以及治理的目的是在改造传统治理模式基础上建立和治理一个全新的社会等。并且,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并不冲突,社会治理看似相对独立地运转,实际上却在国家的政治统治下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到“将来的社会变革”会使国家的“公共性质的职能将逐渐剥离政治色彩,而转变为调节和维系各种社会利益的直接管理职能”<sup>[11]</sup>。社会治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仅仅托付给那些所谓受过培训的独特群体,比如不劳而获领取薪水、且待遇优厚的势利之徒及寄生于国家的蛀虫”<sup>[12]</sup>。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社会治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代表和服务少数特殊利益群体,并成为他们阶级统治的工具。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更高级别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会有哪些类似现在的国家职能中的社会职能直到那时还能得以传承呢?”<sup>[13]</sup>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时担任全体社会职能代表的国家,它能够开始的首要行动”,也是“最终的特定行动”就是“用整个社会形式占有生产资料”<sup>[14]</sup>。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之后,“一切阶级压迫、阶级对抗从此消失”<sup>[15]</sup>,而当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都被人民群众联合体集中掌控后,公共权力就不再赋予政治色彩”<sup>[16]</sup>。也就是说,公共权力不再具有政治统治职能,去除了政治性和阶级性,最终只保留纯粹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职能。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将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大社会治理主体联系起来,说明了各自的功能。新时代我国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推进社会治理效益最大化。国家在保证权威性的同时不能代替全部社会治理,要鼓励社会团体通力合作,优化其治理能力,而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力量,这要求广大青年始终遵循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原则。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对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是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南。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制度思想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制度个人主义者仅仅关注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指出他们忽视了人们之间的彼此依赖和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因为人不只是简单的群居动物,而且是生活在社会并独立于社会的动物”<sup>[17]</sup>。而“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sup>[18]</sup>。因此,制度是所有人的制度。人创立了制度,并通过制度来约束自身、发展自身,直到最终解放自身。这里说的人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体的、现实的、并以实践活动相互关联的人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主体的产生总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只有在共同的交往中才能“使大家的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sup>[19]</sup>。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sup>[20]</sup>,主体的任何活动都具有社会性,并要求多个主体共同参加。与哈贝马斯等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主体间性范式不同,马克思实现了“实践主体性”与“交往主体间性”的有机

统一,从而倡导兼顾个体自我发展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必然性与应然性的论述,为广大青年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思想,体现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并为其指引了现实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格局变化,鼓励各国探索共商共享的治理新模式,更加均衡地体现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形成各个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共同享有成果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全球性实践中,广大青年应充分弘扬担当精神,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思想作为理论指引,展示中华民族的和谐理念和天下情怀,不断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伟大实践。

## 二、感悟制度文明的守正创新: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历史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之际,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贺军科同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要引导青年从历史对比中深刻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伟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帮助青年充分认识我国在国家治理效能、社会发展活力、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sup>[21]</sup>

制度是否稳定关系着国家的安宁,制度是否优越决定着国家是否强大。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怎样的发展之道,最终都会变成特定的制度形式。治国理政的科学理念和成功经验,如果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并有效运行,就很难保证能真正持续地发挥效能。从古至今,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一个国家制度的建设,对该国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民生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制度文明的发展进步,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文明的发展既要继承一些传统制度的精髓,故为“守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文明也要因时而动、与时俱进,在合理范围内作出积极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故为“创新”。

### (一) 制度文明在历史传承中守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载着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的历史底蕴,凝结着中华民族制度建设的智慧结晶。

在我国,最早出现“制度”一词的文献是《周易·节》。文中记载“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sup>[22]</sup>制度最初的本意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的礼数、法度等规范,故亦被称为“规矩”。“治理”一词,在我国古代一般指的是治国之道。《荀子·君道》提到“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sup>[23]</sup>可见,那时的“治理”,是君主如何运用政权来治国安邦,转“乱”为“治”,使无序混乱达到有序和谐。因而,根据治理效果的不同,治理的状态可分为“乱世”或“盛世”等。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思想,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制度文明,形成了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大同理想,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好战必亡的理念等<sup>[24]</sup>,这些优秀制度和思想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养分。在这些思想精华的支撑下,也相应地形成了符合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例如“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制度,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制度,统一的国家文字和计量制度,多民族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民族关系制度,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治理制度,法典化的法律表现形式制度,郡县制、赋税钱粮、科举、监察、吏治、军事等方面的制度传统等”<sup>[25]</sup>。这些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制度文明,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仍然具备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制度绝不仅仅外现为系列强制性的规范,还必须转化为广大青年内在的文化思维和价值认同。这种制度文明是数千年制度思想精华的内在演化与积淀,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植根于国人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传统制度文明的基础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已有制度文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和治理方略,实现了伟大的制度创造。

## (二) 制度文明在历史探索中创新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到,自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扎根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都与中国水土不服,最后,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近代的中国,国力孱弱不堪,人民水深火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百年的实践摸索中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制度,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从而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擘画了美好蓝图,从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成熟定型、日趋完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人民当家做主制度、民主协商制度的建设,深化党和国家机构以及经济体制、司法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确立国家监察制度”<sup>[26]</sup>等等,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显著成就,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与时俱进、自我完善的体现。

可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可靠保障,这些都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我们本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改革奇迹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更是为全人类不断探索建设理想的社会制度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sup>[27]</sup>这是历史和实践证明的科学结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保障,也是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基本依据。新时代我国青年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制度优势,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共产主义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 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的实践逻辑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贺军科同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要引导青年在横向对比中找到‘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制度因素,跳出所谓的西方治理范式和话语体系,‘比’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维护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参与者。”<sup>[28]</sup>

### (一) 在中西比较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无论是在个人意识和思维发生的初级阶段,还是在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或是在构建整个人类知识门类或单一知识科目中有关研究对象分类的‘知识树’的过程中”<sup>[29]</sup>,比较的方法往往能让人们更加清晰、透彻地对事物有所认知,马克思将比较方法称为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sup>[30]</sup>。

“特定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确保政治稳定、健康地发展,同样需要成熟完备的符合政治体系一体化要求的政治文化为其保驾护航。”<sup>[31]</sup>优越的政治制度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一脉相承,是一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在本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进行探索和反思,从而作出明智抉择。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承继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制度文明,借鉴吸收了其他国家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经受了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科学有效,就是要看是否能够依法有序地实现国家领导层更替,能否实现执政党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理,能否对权力运用实现有效制约和监督,能否保障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依法管理以及快速顺畅地表达利益诉求,能否提供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能否建立公平竞争机制,让精英人才有机会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从而保证国家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用这些标准衡量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难发现它的民主、科学以及显著优势,而这些也让我们坚定制度自信更有底气。

近些年,西方社会制度遇到一些现实中的危机难免捉襟见肘,这很好地证明了西方社会制度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完美,而且有时由于其制度的局限性还会制造一些麻烦,给本国和他国人民带来不幸。2008年,由于西方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直到现在仍存在隐患,引发危机的根源就来自西方的制度框架。正如波兰经济学家格热戈日·科勒德克所说“目前的危机绝不仅仅是又一场众所周知的经济周期危机,而是植根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诸多矛盾的更加系统和深化的危机,更是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文化危机。”<sup>[32]</sup>

而且,受西方社会制度所限,当国内矛盾和危机加剧,掌控国家统治机器的资本财团往往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将本国的危机转嫁至他国。2020年疫情以来,在西方国家,比起民众的生命安全,某些政客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危机、维持政治威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诋毁他国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结果,“双标”的政治视角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让国内危机四伏,怨声载道。

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面对国内问题还是国际危机,都展示出强大的优势。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西方国家那样的党派之争,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先进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超越了西方那种狭隘的党派私利,能够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进行制度设计和谋划发展。相对于西方的议会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其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的议会是各党派利益相互博弈的场所,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机关,共同谋划国家民族未来发展。面对国内政治体制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收入分配体制等问题,中国直言面对、从不避讳,且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治理。一次次面对重大灾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非常显著。放眼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的提出,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放包容、高瞻远瞩的特征。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 (二) 在抗击疫情中有效开展青年制度自信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取得实效,关键要突出其时代性与感召力。在对青年进行制度自信教育时,要善于将抽象化的内容作具象化的诠释,从高深的理论层面回归到生活化的场景,从而不断增强教育实效。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百姓、关爱群众的为民情怀,人民群众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无私奉献、共克时艰的中国力量,以及全国上下一盘棋、服从指挥、紧密协作的制度优势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可以说,这场疫情防控战就是一次鲜活生动的制度自信教育。作为青年工作者,应该善于整合和利用这些体现制度优势、彰显制度力量的素材和案例,把对于制度自信的思想、情感、理论认同厚植于青年内心深处,从而激发广大青年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热情。

制度自信教育不应该仅满足于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理论认同,更要上升为价值认同,并转化为实践动力。要引导广大青年明确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着眼国家需求,将“小我”融入“大我”,“自转”纳入“公转”,响应脱贫攻坚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到基层一线磨炼品质、到改革前沿建功立业,在实践中做到深深敬仰制度、自觉遵守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勇于捍卫制度,将制度自信内植于心、外化于行。

“从时代发展的历史纵深把握青年的重要作用,从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强调做好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意义,是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sup>[33]</sup>新时代青年制度自信教育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的工程,青年工作者要善于在科学理论中梳理思路,在历史底蕴中传承精华,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在关注时事中创新元素,在社会实践中提炼方法,着眼固本培元、强化教育引导、落实制度保障,不断坚定青年的理想信念和“四个自信”,做好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 [ 参 考 文 献 ]

- [1][24]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求是》2020年第1期。
- [2] 陆玉林《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 [3] 贺军科《如何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载《求是》2020年第10期。
- [4] 韩 针《生成的存在——关于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 [5][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78、65、68页。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
-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216页。
- [9][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38、196页。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1页。
- [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1、32、35页。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 [21][28] 贺军科《努力提升共青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度》,载新华社官方微信号2019年12月13日。
- [22] 来知德《周易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 [23]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7页。
- [25] 杨宗科《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载《理论探索》2020年第1期。
- [26][27]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载《求是》2019年第23期。
- [29] 张小劲 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 [31] 赵渭荣《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 [32] 格热戈日·科勒德克《新自由主义、全球危机及其出路》,张淑芳译,载《比较》2010年第3期。
- [33] 倪邦文《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王俊华)